

《楚辞集解》刻本的几个问题

熊 良 智

内容提要 明人汪瑗的《楚辞集解》是明代楚辞研究的一部代表著作,屡有创说。由于流传甚少,至今只有万历年间刊本,有“初刻”“补刻”两种本子,其间有不少差异。特别是其中的《天问注补》的作者归属更是桩疑案。又中、日两国皆有藏本。长期以来,则视日本所藏珍贵无比,其实中国藏本就其完整和收藏都较日本藏本为优。

关键词 《楚辞集解》初刻 补刻 中、日藏本

明人汪瑗有《楚辞集解》一书,大约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左右,但流传甚少。《四库全书》仅列存目,至今只有明代万历年间刻本,其补刻本直到1983年还被认为“国内未见”,日本有藏。书中屡有创说,为人称述,故长期以来多为学界注意。曾有一二学者研讨,特别是涉及日本藏本,其面貌尚需论之。这里仅就版刻澄清一些复杂情况,着重讨论《楚辞集解》“天问卷”与《天问注补》的关系和归属,比较中、日两国藏本的优劣,以就教于学术界。

一、两个刻本的概貌

《楚辞集解》有焦竑《楚辞集解序》和汪仲弘《楚辞集解补纪由》。据此,我们知道《楚辞集解》有两个刻本。通常我们称万历乙卯年(1615年)汪文英刻本为“初刻”,戊午年(1618年)汪仲弘刻本为“补刻”。其书的著录,历来都有差异。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《楚辞集解》十五卷,又《蒙引》二卷”;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:“《楚辞集解》十五卷”;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四十八楚辞类存目著录:“《楚辞集解》八卷。《蒙引》二卷、《考异》一卷”;美国国会图书馆《中国善本书录》著录:“《楚辞集解》八卷、首一卷、《蒙引》二卷、《考异》一卷、《天问注补》二卷。”细检明刻原本,知乃诸家所录刻本与计卷方式不同。前三家著录,显系汪文英初刻本,而美国《中国善本书录》所录则为汪仲弘补刻本,故又有《天问注补》二卷。《楚辞集解》一书本不标卷数,其《序》、《集解》诸篇、《蒙引》、《考异》各自为卷。《集解》八卷与十五卷之别,在于八卷者,以《离骚》分上下为二卷,《九歌》以下一篇为一卷,共六卷,《九章》又每篇别行计卷与页码,共为九卷。

两个刻本中的内容也有不同,主要指卷首的三个“序”和《天问》注解的差异。

卷首的三个“序”,即归有光嘉靖戊申二十七年(1548年)所作《楚辞集解序》、汪瑗《自序》和汪仲弘《楚辞集解补纪由》。仲弘《纪由》明属补刻系统,归《序》和汪瑗《自序》理当初刻所有。但是,笔者从上海图书馆藏所见,以及杭州大学崔富章先生所据浙江图书馆藏初刻本,均不见归、汪二

《序》。汪瑗之侄汪仲弘又在补刻本中记述：

《天问注补》将竣，从兄英(汪文英)子麟(汪麟)自新都携归太仆《楚词序》。伯父《自序》暨送伯父游豫章二序至广陵，云自败篋中检获。余始疑之，阅其词，婉然伯父口吻。太仆《序》中所叙惴惴，又先君(汪珂)庭居时以示余，而人未之知者……且数序藏篋中数十年，从兄索之不得，今《补注》竣役，乃得之。

据此，初刻无归《序》与汪瑗《自序》，只在刊补刻本时，才于检获之后补刻上的。再从日本小南一郎教授调查日本所藏《楚辞集解》的情况分析，他认定为第一类(初刻)的三个本子：京都大学乙本、内库文本、小田切本也都无归、汪二人之《序》(参后)。这证明汪仲弘所述并非虚言。因为古书之佚，残缺虽为常事，尚不至国内外所藏本子残缺的内容都完全一样。相反，作为补刻本，无论是日本所藏国会图书馆本，或是国内北京图书馆、四川省图书馆藏本都有归、汪二《序》，以及仲弘《纪由》。另外，属于补刻系统的日本京都大学甲本，虽缺归《序》，而汪瑗、汪仲弘的序却存在。所以，有的学者认为，归、汪二《序》初刻应有，只是我们所见本子亡佚了，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。

汪瑗《自序》使我们了解到了作者著述《集解》的出发点和宗旨，而归有光署于嘉靖戊申七月的《楚辞集解序》有利于我们了解书成的时代，即其书至少成于归《序》所作年代先后。但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其归《序》则署其时为“万历戊申七月”，则时间后退到了1608年。据焦竑万历乙卯(1615年)之《楚辞集解序》云：“君(汪瑗)既逝之五十年，子文英欲梓行之，以公同好，而属余为弁”，当知汪瑗于万历戊申之时早已死去，而归有光亦早已去世。于是，有人据以为万历戊申乃其书写上版之年。但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，北京图书馆藏本看到，归《序》所署依旧为“嘉靖戊申”，或知四川省图书馆明藏当为后人挖改。

古今书录均不见说二《序》之事，又其著录内容亦不尽一致，故于此略述其概。《集解》初刻本无归、汪二《序》，其中《天问》一篇，只有汪瑗于朱熹《天问集注》旁批注二十条，谓之“天问初解”；补刻本新增三个“序”，删去“天问初解”，而代之以《天问注补》二卷。初刻之书虽仅早汪仲弘补刻本不过三年，但汪仲弘就对其《天问》的内容有了同汪文英不同的看法。汪文英初刻本的《天问注跋》说，所谓“初解”，乃是汪瑗于朱熹《天问集注》篇上原存的批注(参后)，而汪仲弘在《天问注补引》中则说：

《天问》全注，莫知所攘，建鼓而求，终莫能返。从兄英恐存者久复散轶，副墨以公于人，于所缺注，取考亭氏以足之。

按此说，则初刻《天问》一篇之注并非汪瑗本人于朱《注》原书之批语，而是汪文英取朱熹《天问集注》来补足的。又仲弘于补刻中于汪瑗“天问初解”竟无一字言及，且《天问注补》中，凡与汪瑗“初解”之说相同之处，汪仲弘称为“旧注”。鉴于以上种种，更使我感到了其书的复杂和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。

二、《楚辞集解》天问卷与《天问注补》

《楚辞集解》初刻本与补刻本差异最大的是《天问》的注解。汪文英初刻本曾有《天问注跋》叙述其原委：

《天问》之注，为近属辈藏匿，欲淹没先人之善，……不肖荒谬，不敢妄补。谨将初解之书，微有字句在于朱《注》之旁，今梓之，使读者因一斑而窥全豹耳。

《跋》语所述，与笔者所见初刻之书相合，《天问》一篇仅有汪瑗批注二十条于《天问集注》之旁，为

二节版，而补刻本《天问》已成为完整之注解，即《天问注补》二卷。这个变化引起了学者们的怀疑，特别是《跋》语又明言有“近属辈藏匿”汪瑗《天问》之注。因而有的学者认为：《天问注补》并非汪仲弘所作，而是汪瑗《天问》之注的原文，即《楚辞集解》天问卷，汪仲弘就是藏匿汪瑗《天问》之注的近属辈。这就涉及到了《天问注补》的归属问题了。

归有光的《楚辞集解序》在叙述汪书的成因、赞叹汪瑗的才识时，曾经谈到过汪瑗的《天问》注解。他说：

至于《天问》，乱丝攒绵，纶绪纷之，一目而领其概，再目而得其详。读之，令人一唱三叹。

可以证明，如果仅有“初解”二十条批注，归氏是不可给予“领其概”而“得其详”的评价的。所以，我们推测：汪瑗生前似乎已经完成了《天问集解》，以后又遗失了。至于藏匿之“近属辈”，或即汪仲弘，也并非仅属臆测。但是，肯定说《天问注补》二卷就是《楚辞集解》“天问卷”原注，其作者即为汪瑗，笔者以为还值得研究，试述于下。

首先，《天问注补》同《楚辞集解》全书体例不一。北京图书馆藏十六册本《楚辞集解》，第六、七两册为《天问注补》。卷首《天问注补》后有《凡例》六条：分章、绘图、采辑、考异、叶韵、音释。其“绘图”一例云：

事关天地阴阳，非图不显。自设卦象以至河洛呈祥，图书之说，有自来矣。篇内所问，圆则方舆，二曜列星，不为图以明之，即巧历不能析其精。顾其书藏自灵台，非草野之所获见。今即保章之所颁布与群书之所施行，明以示人者，共分十图仿以绘之。

书中所列之十幅图为：“圆则九重图”、“南北二极图”、“山海舆地全图”、“十二支宫属分野宿度图”、“日月五星周天图”、“太阳中道之图”、“太阴九道之图”、“列星图”、“明魄晦朔弦望图”、“古今州城新旧河道舆图”。《楚辞集解》全书无图，独见此《天问》一篇。或如《凡例》所云“事关天地阴阳”者，亦非仅止《天问》。《九歌》中天地神祇，日月星宿，山河湘水，《远游》中“问天微”，“历太皓”，“过句芒”，“经营四荒，周流六漠，上至列缺，下降大壑”，是否可算事关天地阴阳？

《天问注补》每章后用赞语，此亦与《集解》全书不谐。汪仲弘在《天问注补引》中说：“因忘陋愚，采辑群注。爰效司马索隐，篇末各缀韵言，专对不烦，谏诤微离。”我们看在“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”下的一段赞语：

本章三条六问，拟赞以对：

混沌初启，太极未仪，俯仰无象，观察何稽。先天一窍素篇靡遗，今古何照，道器兼知。由近及远，缘显通迷，无俟传说，能自得师。阴阳代禅，明暗互移，卷舒任运，开合惟时。为而不幸，行尽如驰，自本自化，始斯终斯。诚能参赞，位育我司。

这种拟赞的方式，也是《集解》全书不见的。汪仲弘又言乃效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，明确说明了自己体例的特点。

由是而观，凡书之有《凡例》者，皆就全书而言，表明整部著作的体例。而《天问》专列《凡例》，不仅不合历来著述之旧，亦与全书本身不谐。如果《天问注补》为《楚辞集解》的一部分，同为一人所作，自应有统一的整体结构。通考《集解》全书，各篇注解自有分章、采辑、考异、音释，尤其是还有《蒙引》二卷，专门采辑众说，辩证义理，文字音韵；有《考异》一卷，罗列和考订异文。而汪瑗不著《凡例》于全书之首，而独创《天问》之前，恐于常理不通。

其次，《天问注补》与汪瑗的许多观点相悖，与《集解》整体的思想不合，而且有的地方还采取对汪瑗的观点直接批驳的方式，这就更不象同一个人的著作了。

汪瑗最著名的观点，也是贯穿《楚辞集解》的思想，即否认屈原投汨罗而死。可是，汪仲弘的

《天问注补》不同,他肯定屈原自沉汨罗,而且以“汨罗”代指屈原精神。他说:

三闾篇什,今固焯然,而汨罗一沉,绝笔无价。(《纪由》)

庶几少继伯父之志,以阐汨罗之志云尔。(《天问》解題)

在《天问注补引》中,汪仲弘说:“余伯父学富天人,才工诗史,……窥屈氏抑郁之志,拮其全简,显微阐幽,《天问》尤发其奥,直驾扬刘,以为汨罗知己。”这些表述都说明汪仲弘是以“汨罗”代表屈原的。如按汪瑗一贯的观点,屈原既未投汨罗,又怎么可能用“汨罗”之志来代表屈原精神呢?汪仲弘的观点与汪瑗最主要的思想恰好相反,足证《天问注补》绝非出自汪瑗之手。

在《天问》的注解中,《注补》与“初解”的分章、解说、持论上亦有不少差异。“鯀何所营,禹何所成?康回凭怒,地何故以东南倾?汪瑗“初解”云:

此上言鯀、禹之事,而下二段言地理,盖地平天成,实鯀、禹之功,故屡言之。

但《天问注补》以为“康回凭怒”二句不应与“禹何所成”为一章内容,说:

旧本此二句属“何所成”句下,以韵之同也。但篇内自“不任汨鸿”至“何所成”,尽言鯀禹治水事,当自篇(?)为一章,不应以共工事插入。如不察其义段,而只以韵连,是贵耳而贱目也。

又“女歧无合,夫焉取子九子?伯强何处,惠气安在?”汪瑗“初解”云:

此上十段,皆问天道,女歧一段,疑错简在此。

而《天问注补》于此条不见错简之疑。

不仅如此,《注补》和“初解”有的观点还是针锋相对的,似乎《注补》中的一些看法正是针对“初解”而发,直接批驳汪瑗“初解”的观点。如:“日安不到,烛龙何照?羲和之未扬,若华何光?”汪瑗“初解”说:“此四句乃断之之词,屈子明辟其世俗之妄矣。”《天问注补》却针对其说,发表不同意见,说:

一说此四句乃断之之词,非语句之词,言岂日有不到之处?岂龙而能衔烛之理?岂若华而能代之光?屈子明辟世俗之非,于义亦通。但通篇文意俱属问难,不应此四句独异,当更详之。

《天问》末句“吾告堵敖以不长,何试上自予,忠名弥彰?”汪瑗“初解”之说可谓楚辞研究中之一大发明,他说:

今原哀怀王将如堵敖之不长而死,故告之。

二句言弟恽即成王也。恽既杀兄自立,当时有以忠名之者,屈子怪而问之。

试当弑。声、画相近而误也。……予与同。自予,自取也。谓弑其兄而自立也。上,君也。兄既为君,则恽则臣矣,故曰弑上。

而《天问注补》乃录王逸之说,不仅内容理解与“初解”不同,而且直斥“初解”之说为非。我们看《天问注补》的说法:

堵敖,楚贤人也。屈原放时,语堵敖曰:楚国将衰,吾将以身报之,不复能久长也。告之不长者,知己谈心,自露忧悃,何敢尝试君上,自号忠直之名以希显彰后世乎?

旧说又谓弑弑同;予,与也,自予,自取也。谓恽弑其君而自立也,而当时有以忠名之者,故屈子问之。此说更非。

既曰吾告,又曰自予,屈子自道无疑矣。

“此说更非”四字,正是汪仲弘对汪瑗的观点的直接否定,足以说明《注补》与“初解”的作者非为一人。

再次,在《楚辞》韵读上,汪瑗是不赞成“叶音”说的。汪瑗认为,古人一字本有不同的音读,故主张根据原有的不同音读以读古人韵文,而求其叶。而讲“叶音”说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,主张随

意改变音读以求其叶，不管古人有无此音。汪瑗批评说：“此所以协韵之不能尽考其说”（《蒙引·化离》）。并说：“随所用韵转音耳，不必协也。古人谓字有数音是也”（《蒙引·蔽折》）。汪瑗的“转音”，就是根据同一字原有的多音确定韵读。“字有数音”，这是客观事实，韵应根据这个客观事实来就读，不能根据上下文临时需要去改读字音。当然，汪瑗并不明白古一字当有一个本音，一切应以此本音为准。至于其他音读，乃是后来之变音。凡押韵者，皆读本音，不能随变音而读，以成其协。不过，这只是汪瑗探寻解决“叶音”说的方法不够科学，而不赞成“叶音”说确是事实。然而，《天问注补》却是采用“叶音”说的。同书《凡例》“叶韵”条说：

第韵有正有叶，叶韵云者，旁韵协助以成章也。

卷末“叶韵”一例，共列六十四字。如云：“化，音灰，与‘为’叶”。“加，音基，与‘亏’叶。”此正与朱熹《集注》相同：“化，叶虎为反”，“加，叶音基，亏如字，又叶苦家反”。我们知道，《楚辞》中“化”与“为”韵，因它们同属古韵歌部；“加”也属古歌部字，与“亏”字为韵，“亏”则属合韵（参段玉裁《六书音韵表·四》第十七部）。这些字的读音虽后世有所变化，但以《楚辞》的音韵系统来考察，则不得以“化”为“灰”韵，以“加”字叶“基”音。汪仲弘这些临时随意改读字音以就韵的方法，与汪瑗的观点显然不同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：《天问注补》并非《楚辞集解》天问卷，作者也并非汪瑗，而是汪仲弘。当然，《天问注补》确曾采纳、甚至照搬了汪瑗的观点和材料，比如《天问》首句的解说，《注补》和“初解”几乎完全一样，但是，《天问注补》毕竟有它自身的体例、观点和材料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编号17319著录《天问注补》二卷，题为“明汪仲弘撰”，结合参看《注补》的《凡例》和《引》言，或可进而佐证它确是自有规模，独自成书的。

三、《楚辞集解》的日本藏本

说到刻本，笔者还要谈谈日本的《楚辞集解》藏本。游国恩先生曾在《楚辞注本十种提要》中专门介绍过《楚辞集解》，并在《离骚纂义》、《天问纂义》引用过这部书的日本影片。现藏于北京大学者，即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、三好新次所赠。姜亮夫先生《楚辞书目五种》著录是书，“明万历四十六年刊本”，注称“日本京都大学藏，不知刊年。据报端所载，谓有归有光序，称足本。现有影片藏北京大学，余未见，俟访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影片”和“足本”皆是指的汪仲弘所刊补刻本。当时国内未曾调查，只知日本有此刊本，故可谓珍贵无比。直至1984年，杭州大学崔富章先生调查研究后，撰《明汪瑗〈楚辞集解〉书录解题》，才知国内有多家收藏。那么，日本所藏《楚辞集解》是什么情况，那个报端所称的“足本”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同国内藏本相比，优劣何在？

日本株式会社同朋舍于昭和五十九年（1984年）八月出版了日本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《楚辞集解》，末尾附有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先生的一篇《解说》。关于《楚辞集解》的藏本，他作了调查研究，说：“为了写这个《解说》，现在我调查了在日本能够看到的《楚辞集解》有多少种，如表所示，各个都有残缺的部分。”这里，我照录其表于后：

	I			I		II
	京大乙本	内阁本	小田切本	京大甲本	国会本	阪大本
焦竑序	残 1	O ₂	×	×	0	0
归有光序	×	×	×	×	0	0
汪瑗自序	×	×	×	0	0	0
集解补纪由	×	×	×	0	0	0
大序、小序	O ₄	O ₁	0	0	0	0
目 录	O ₂	O ₃	×	0	0	0
(各册装订目录)	O ₃	O ₄	×	×	×	0
集解, 离骚	0	0	一部写本	0	残	0
九歌	0	0	0	残	×	0
(天问)	0	0	0	×	×	0
九章	0	0	0	0	0	0
远游	0	0	0	0	0	0
卜居	0	0	0	0	0	0
渔父	0	0	0	0	0	0
蒙引	0	0	0	×	0	0
考异	残	0	0	×	0	0

O→存在部分 ×→缺的部分 O旁的数字表示排列顺序

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,表上的 I 类即初刻本, I 类即补刻本。II 类只有一个阪大本,据小南一郎先生所说,此本“主要以国会图书馆本为底本,国会图书馆本所缺的部分由京大乙本等其他本补足”。按此,阪大本不是原书刻本,而是几个本子组合而成。表上又未见被中国学者称引的上野图书馆藏本,但据小南一郎《解说》,我们寻到了它的根源。小南一郎说:

国会图书馆本,明刊本 5 册,原为上野图书馆所藏。从《集解》的《离骚》篇的后半直到《九歌》篇部分都是残缺的。

也就是说,国会图书馆的藏本就是上野图书馆藏本,它并不是一个足本。

通过中国国内刻本的清理,我们知道了《楚辞集解》两个刻本的内容有差异。因此,足本的判断,还应根据对刊本的确认。据笔者所见,今上海图书馆藏四册本,即与日本“内阁本”相似,可以称作初刻的足本,因为初刻本原来就无归《序》、汪瑗《自序》和汪仲弘《纪由》。只是两“本”焦《序》和“大小序”的顺序稍异,上图藏本焦《序》在“大小序”前,日“内阁本”在后。根据《楚辞集解》各册

装订目录，其秩序应以上图藏本为是。表上所列有归《序》的本子，即Ⅰ类之“国会本”“京大甲本”虽缺归《序》，亦当属此补刻系统。它们都有残缺，而且作为补刻本的主要标志的《天问注补》皆无，说明日本没有一个补刻本的原书足本。因此，我们说日本的《楚辞集解》虽有三个系统，只有一个“内阁本”为初刻足本，阪大本又并非原刻，其余四个藏本皆是残缺不全的。而报端所称日本度藏有归《序》的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“足本”也不符合事实。

至于日本株式会社出版的京都大学的汉籍善本丛书《楚辞集解》影印本，内容似乎完整，但它仍然是几个本子整理组合的结果。小南一郎先生大概是整理此书的主持者。他在《解说》中介绍道：

这里影印的《楚辞集解》，以京大甲本为主体。不过，如附表所示，京大甲本有很多残缺部分。其残缺中前面的焦竑《序》与归有光《序》，以及最后的《蒙引》与《考异》，由国会图书馆本来补充，中间的《九歌》篇到《天问》篇部分由京大乙本补上。

小南先生的介绍非常清楚了，这个本子是以补刻本为主，而兼以初刻本的内容，其《天问》篇的内容，就是初刻本的《天问》初解。

我们说，从整理古籍的目的来看，古籍出版要考证源流，弄清本来面貌。象《楚辞集解》两个刻本在内容、思想观点上都有差异的情况下，这种组合的意义就值得探讨了。即或如小南一郎先生已经声明过的：“这从刻本的统一性看，也许有问题。”“但为了读者今后更深入地研读《楚辞集解》，这种体式的刻本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。”然而，由于对两个刻本的面貌深入研究不够，只求齐全，不顾源流。一方面收集了所有的“序”“跋”，不管是初刻本的，还是补刻的；另一方面又试图恢复原刻面貌，《天问》篇只影印了《天问》初解。我以为，如果真要求齐备，或该将《天问注补》二卷一并影印；如果考虑刻本面貌，则既收《天问》初解，就不当存补刻本新增的几个“序”；或者收录上述诸“序”，则应载《天问注补》，不复留存《天问》初解。总之，以某一刻本为主，不同或所缺者以附录形式载入，似乎更理想一点。不过，我们也能理解他们的整理组合不尽令人满意的原因。正象小南一郎先生在《解说》中谈到过的：对于全书“很难确实地说出本来的版本”。对于《天问注补》，由于“京大甲本”、“国会图书馆本”都残缺，因而“实际的样子不得而知”。因此，我们说曾视为珍籍的日本《楚辞集解》版藏，并不比国内藏本优越。因为国内藏本不仅保存了各自刻本的面貌，而且皆为足本，无残缺。当然，由于资料本身的限制，从小南先生的调查可知，日本所藏皆无《天问注补》，所以，为了研读的需要，株式会社出版了这样一个整理组合本，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。